

# 作家慎勿迎合“审美套路”

东西

# 双塔

冰心



## 亲民的将军 亲近的书写

王珊珊

“可是一个好老汉儿”，朋友的这一句称赞引起鲁顺民的注意。燃烟扶额，思谋着，他收拾出一提行李，前往张家场村采访这位“好老汉儿”。张家场村在山西大同左云县，这位“好老汉儿”叫张连印。

张连印的头衔有很多。少将军衔，河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，“当代愚公”“绿化将军”“新时代的甘祖昌”“穿军装的杨善洲”“山西省优秀共产党员”“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”“时代楷模”等等。要读懂这些头衔，须认真读一读鲁顺民老师创作的人物传记——《将军和他的树》(大象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)。

这位共和国将军，前半生带兵，后半生选择回老家种树，饮风咽沙，散尽家财。《将军和他的树》告诉我们，这一切的选择，不可思议却又又是意料之中。这本书的前半部分，由张连印青少年时期家乡生活、退伍后回乡种树两条线叙述，历史的苦难和荣光，生活的磨难和人间的温情，都在张连印将军心里孕育下一颗颗美善的种子，荫护着他的拳拳赤子心。后半部分从侧面进行人物形象的重点塑造。在讲故事中叙事，情景呼之欲出，很快就能将读者带入叙事状态中。同时，侧面铺开是作者认真采访调研，尊重并呈现客观事实的结果。

妹夫安殿英眼中的姐夫，池恒广眼中的老党员，张晓斌眼中的父亲……每个反映主体都从种树切入，但连续起来的人格具有更强的感染力和震撼性。创作传记文学，易陷入歌功颂德、好人好事的圈子，而鲁顺民老师以张连印为轴心，将周围的人物、周围人物对他的认识评价作为反映形式，通过侧面记录和描写让我们知道，种树事业并没有因为张连印是将军而一马平川，而是因为他的坚韧与初心，创造了生态奇迹。从这一点立意出发，张连印的形象丰满起来，人物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被关注起来。

前因后果的叙述，作者采用瓮式结构，以情景转换的方式将故事展展开。每一章节或转换时间，或转换空间，或转换采访对象。这样的布局不仅没有杂乱违和之感，反而更能吊着读者口味，节奏张弛有度地层层铺开。不难发现，作者关注将军的生平，立意于人物形象的塑造，视野却是宏阔的，创作主题并没有成为作者笔端的局限。文中易见的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关注。第七章中，作者提到乡村社区空心化、老龄化的问题，随着城市的扩大与发展，“三农”问题将更加复杂多变。

本书的语言风格，也是做了精心的选择。作者把地道的雁北方言引入文本叙述中，对语言的驾驭能力，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在得知张连印退伍回村种树时，好友胡万金一遍遍劝解：“别人都着不成，你就能着成？”“这个讨吃货，那地方能种成个树？”“着不成！”胡万金对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，有栽树失败的经验教训。因此，得知张连印一门心思要在村里植树时，千劝万劝化成一言“着不成”，千劝万劝化成一言“讨吃货”，简洁明确，感情却喷张有力。张连印回乡种树第一步是建苗圃基地，当时北方进入寒冷季节不适合施工。“那雪！下得！墩墩的！”“墩墩的”三个字，将盖房时的大雪和将军种树的决心、行动力、号召力，扎扎实实，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。

本书的主角是时代楷模张连印将军，严肃雅正的形象，作者用方言俚语表现，在雅俗之间建立起一座稳固的叙述桥梁。如果是一本正经地打官腔，不仅缺乏艺术性，且与传主的形象格格不入，而过于朴素的语言也不易控制，难免会干涩难读。作者没有总结过却时刻在论证着张连印的品质和功绩，这是因为作者将其身上的精神价值作为终极关怀。而这样的叙述模式与张连印本人也是极为契合的。张连印的前半辈子基本是在部队度过的，练就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回乡几年自然操起地道的左云方言。他从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这片乡土，也从没有忘记要回馈、回归自己的乡土。时隔40年的回归他称之为“第二次融入社会”，“重新融入，意味着着重体味时代大潮汹涌，重新体验人生况味，重新理解社会的多元和纷纭，也重新获得另外一种成就”。

文中也常常采用复述、对话、自问自答等形式。讲述干脆利落，情节俏皮有趣。如此，人、事、物都更加立体具象。尾章只有7句话：  
告别将军，把酒相揖。  
我言：从此以后，我就称您是叔叔了。  
将军道：可以，叫我老哥也好！  
谨慎诚恳：哪里敢，我跟斌斌一辈，还是叫叔叔的好。  
我唉一声：平安叔。  
已经进入乡俗，口音完全是张家场的人啦：平南收！  
将军喜极，道：哎！  
一杯酒，一句“平南收”，蘸满了深情，为亲民的将军、随和的好老汉儿作了具象的总结。简单的几行，事件随意而自然，人物鲜活而真实。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来源于百度

当这种无意识被作者过度重视，那作品的同质化自然就不可避免。

所以，便利的“双向输入”不一定是好事，假如作者不稍加警惕，就很容易落入写作的套路。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写得好的套路作品，更有许多写得不落俗套的伟大作品，比如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、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、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、列夫·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、彼得·汉德克的《骂观众》等。当然，即便贵为名著，也仍然有网友(他们不一定读过作品，所以不能称为读者)在网上狂“喷”，说某某作品读不懂，是伪名著。如果这些作者还活着，那他们听到了这些意见后，会不会因为怕被“喷”而改变创作的路数呢？

真实的意见不等于正确的意见。我们在尊重网友的同时，也必须承认写作是一门专业，它需要专业的训练和长期的感悟与坚持。当大家都把写作当成没有门槛的手艺时，作家的定力便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。

观众参与创作，他们一边拍摄一边听取观众意见，然后再让编剧按照大多数观众的选择演绎故事、塑造人物。这种创作方法曾引起我的关注，并相信它是拯救写作的最佳方式。我之所以推崇此法，是因为坚信作品是拿来读的，而读者是有智慧的，尤其大多数读者达成共识的选择一定是正确的选择。是的，我天然地具备从众心理，无条件地崇拜大多数。

然而，似乎不对，好像哪里出了状况。为什么创作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？为什么作品的结尾总是大同小异？为什么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总是那么近似？为什么情节除了反转还是反转直至永远反转？如果对这些问题稍加研究，你就会发现审美是有套路的，也就是“审美集体无意识”。当我们看一部主人公遇险的作品时，总是希望他(她)安然无恙；当我们看一部婚姻危机的作品时，总是希望他们不要感情破裂抑或能够破镜重圆……这种近似的心理期待就是“审美集体无意识”。

## “为情造文”而非“为文造情”

李秋生

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，中国古代文论尤其强调有感而发，因此有“感物吟志”“为情造文”“不平则鸣”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等说法。这些说法的具体言说语境有异，但都强调了文学写作的发生，必须建立在写作者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有所感触的基础上。作家心有所感，于是“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”，然后才催生出具有艺术美的文学作品。

具体说来，“有感而发”的“感”和“为情造文”的“情”从何而来呢？从现实生活中来。作家平时就处在一定的生活之中，有时候还为了一定的题材专门去深入生活，以积累创作素材。但光有泛泛的积累还不够，作家真正开启创作还需要一个触发点，一次刺激。这样，长期积累的素材和情感，才能找到合适的表达突破口。

对文人来说，这种“刺激”是珍稀资源，不是说有就有的，那是一种特殊体验，需要有日积月累的体验作为基础，需要你对象对写作的深入思索作为前提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“刺激”虽然可能来自外在的因素，但却跟写作者的内在情感相互契合、相互激发。因此，在这个意义上，写作者写出的才是自己真正的情感，是因为情感的需要而开启写作。此乃真正的“为情造文”。

当下的文坛中，不乏真诚的作家、真挚的作品。作家之中，有的甘坐冷板凳，十年磨一剑，不理睬文学潮流的起伏，认真打磨自己内心真正要写的那部作品；有的为了创作一个题材的作品，长期深入生活，进行丰富的素材积累，持续地寻找写作的突破口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承认，许多文章好像不是发自作者内心而写出来的，而是“做”出来的。

有的写作是为了完成任务。为了应付一些主题约稿，为了给一次采风活动交差，这样的写作大都有“任务”之嫌。当然，即使为了完成任务，也有作家能够积极调动自己的积累和经验，写出了漂亮的文章，甚至成为名篇。但是，很多“任务式作品”都写得怎么样，因为这不是出于作家的本心，这让我想到鲁迅所说的，“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”。自己给自己下达任务，可以不可以呢？比如，必须每天写一两千字，雷打不动。这似乎无可厚非，特别是学徒期，坚持勤奋练笔自然是好事。可

是，像网络作家那样，必须每天更新，被一种“机制”逼着写作，是不是好处、坏处并存呢？

对有些作家而言，写作变成了一种“生产”。他们好像不是文学家，而是一批生产商，夜以继日地构思、写作、发表，清点稿费。书房变车间，作品变产品，难免悲剧发生，粗制滥造，浪费纸张。尤其是一些专写历史典故的杂家，他们一篇接一篇推出历史典故，通常开头一段古代轶事，末尾加一两句个人感想，低成本，高效益，好发表，易转载。老实说，那些典故看似深奥，但在历史学家眼里是“小儿科”，在稍有点文化的人眼里是“炒冷饭”，就是寻常百姓，偶尔读来感觉有点新鲜，久而久之便味同嚼蜡。

有的写作是为了“约稿”。手机上时常会收到这样的信息，“请给我投一票，我参加了××诗歌大奖赛”云云，写诗难道是为了评奖？太把这种网络投票的大奖赛当真，不太合适。还有，有的人急于发表，确认自己作家“身份”，竟愿意“复制”别人作品，这恐怕是文坛上最糟糕的事了。还有诗人，把参加A地诗歌大赛的稿子稍微一改，比如改一下地名和习俗，然后又投到B地诗歌大赛。这样的“写作”还称得上写作吗？

优秀的文学作品，大多是作家内心受到真正的触动而写出来的。屈原“发愤”而写就《离骚》，司马迁心怀志向而著《史记》，曹雪芹受“刺激”创作千古《红楼梦》……他们的作品中有时代、有自我，感染了一代代读者。因此，对于当下的写作者而言，不必勉强地进行创作，你没有那份情要表达，就不要“为文造情”、矫揉造作。更进一步地，如果一个人没有写作的那份才华，就不要着急地挤入写作圈子，先踏实地生活，踏实地积累。积累够了，情感有了，文学自然就来了。

文无定法，唯情满自溢耳！坚持“为情造文”，而非“为文造情”！



## 文学给了我另一种生活

榆木

这次能作为一名基层写作者，从工作15年的矿洞里走到文学殿堂，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“作家回家”活动，我感到非常荣幸，也深刻体会到中国作家协会是真正将工作渗透到基层、将力量团结在基层、将服务深入到基层的一个团体。

这也让我重新思考煤矿、文学和矿工的意义。以前在煤矿，我总在问自己：为什么要下井？后来接触到诗歌之后，我总在思考：为什么要写诗歌？

我19岁开始从农村走到煤矿。作为一名矿工在煤矿的生活历程，总结起来很简单：年轻的时候在一线岗位干几年，干不动了就调整到二线岗位，然后等着退休，这也许就是井下井的意义。

几年后，我从井下一线岗位调到井下二线岗位，每天不再干重体力活，这让很多工友羡慕，而我也不再幻想离开煤矿的工作。但当每天一个人待在我最低点的水仓时，我看看下我的一生如此单调地重复，觉得一切生活都没有了激情，那时候，我刚刚25岁。后来接触了文学，提笔写下一分行的诗歌作品，开始把所有的思想和情感都放到文字里。我常常在写作的时候问自己，如果这是我要写下的最后一首诗，我会写什么？那一刻，隐隐约约知道了我写作的意义。

这次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“作家回家”活动，特别观看了话剧《杜甫》，突然想到：如果按照仕途的角度去看杜甫的一生，他的每一步都是意外，看似是错误的；如果按照文学的角度看他的一生，那么他的每一步又都是必然，都是成功的。这让我想到自己：如果从煤矿的角度看自己，我觉得一切都是意外；而从文学的角度看自己，我在煤矿里走的每一步又都是必然的。所以，不是我选择了煤矿，而是煤矿选择了我；不是我在写诗歌，而是诗歌在写我。我接受生命里的一切所遇，然后用自己的视角进行解读：我把肉身当成参与者交给生活，把灵魂当成旁观者交给文学，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的人生。

在矿井里的很多工作细节，带给我对生存和生活的思考，对知识和真理的探究。比如，当初和我同一天到煤矿报到下井的工友们，会修电视的到了机电组，会开三轮车的到了运输班，而那位放羊的几年以后当了班长。我当时就问自己，为什么人家能当班长？后来慢慢发现，这位工友对生活的态度永远是：勤劳、质朴、不抱怨、不偷奸耍滑，让干啥就干啥。因此，我相信一个人越平凡，为他敞开的门就越多。

再比如，每天下井戴的防尘口罩，每名矿工都会在里面放两个防尘棉，有的工友甚至放三个防尘棉。大家都知道，防尘口罩里面放一个防尘棉就可以，但为何大家会多放？我问过很多工友，他们回答不上来。我问自己，自己竟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。后来渐渐明白：每当我升井后打开防尘口罩，取出黑乎乎挂满煤灰的防尘棉，看到另外一个雪白的防尘棉时，内心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。那一刻我明白了，当知识解决了现实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的潜意识就将知识神圣化，让我们的内心相信多放的防尘棉，一定会挡住那些更微小的煤灰。

我想正是这火热的生命，在不断地激发着我的创作潜能。而我正好处于矿工生活的第一现场，煤矿、文学和我，我们都在各自的维度里努力地活着，却又相互纠缠。所以，作为一名煤矿工人，我将认真生活：作为一名写作者，我将用尽气力去揣摩时代应有之画像，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。



花开月明 张颌书



小葵与蜀葵 牛力绘



那年蜀葵花开 铁子绘

11月13日至12月3日，以“花开成海——一本书的多重打开方式”为主题，由山西作家蒋殊散文集《阳光下的蜀葵》延伸出的书画、摄影、剪纸作品展览，在山西省图书馆第二展厅举办。

该展览由山西省图书馆、太原市新闻出版局、三晋出版社联合主办。每一幅书法、每一张绘画、每一幅影像，或一页剪纸，都是对书中文字内涵的生动诠释。这些作品告诉观者，文字的魅力不仅仅停留在纸上，一本书，可以延伸出多样的艺术形式，就如一把撒下的花籽，最终开出花的海洋。 忆鸣

## 太原诗词学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召开

11月19日上午，太原诗词学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在并召开。太原诗词学会会员代表及十县(市、区)文联主席等90余人出席会议。

会上，太原诗词学会第三届委员会作了工作总结报告。大会产生了第四届理事会，选举王宏伟为太原诗词学会第四届会长。新一届学会将在太原市委宣传

部、市文联的领导下，团结和带领全体会员，不断壮大诗词创作队伍，深化诗词文化研究，深入开展诗词社区、诗词学校、诗词机关创建等工作，让诗词之花开遍并州大地。山西诗词学会、太原市作家协会、太原市文艺评论家协会，以及阳泉、临汾等地的30余家文学组织发来贺信、贺诗。 孔文越



作家生活